

引用格式:李瑞盛,周文凤,徐定德.农户分化视角下稳定土地承包意愿差异[J].山地学报,2024,42(5):726-738.

LI Ruisheng, ZHOU Wenfeng, XU Dingde. Peasant household diversification and associated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renew land contract [J]. Mountain Research, 2024, 42(5): 726-738.

农户分化视角下稳定土地承包意愿差异

李瑞盛^a, 周文凤^a, 徐定德^{a, b*}

(四川农业大学 a. 管理学院; b. 国家粮食安全与天府粮仓重点实验室, 成都 611134)

摘要: 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重塑农户的收入结构和土地利用方式。第二轮土地承包期临近结束, 不同类型农户对维持当前土地承包关系的意愿是否存在差异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中 3804 户农户数据, 采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 研究农户分化对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 (1) 农户已分化为生存型小农、生活型小农、生产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 样本中各类农户占比分别为 2%、70%、1% 和 27%, 其中 45% 的农户希望在二轮承包到期后对土地进行调整。(2) 相较于生存型小农, 生产型小农在土地延包意愿上没有显著差异, 而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承包关系意愿。(3) 市场资源较丰富地区、山地丘陵地区和非城郊区的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更倾向于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为有效解决农地稳定经营与农户调地诉求之间的矛盾, 缓和人地关系, 保障土地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提出两点建议: (1) 尊重农户分化现实情况, 对不同类型农户实施差异化土地政策。(2) 充分考虑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约束, 因地制宜地探索土地延包和调整政策。研究成果可为推进土地政策的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土地承包关系; 农户分化; 土地调整; 土地流转; 土地承包意愿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 平衡土地与农民的生产关系是农业建设的核心任务。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对激发农地投资活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然而,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户的土地承包出现了新的特征, 面临着土地碎片化、劳动力短缺、机耕道路及灌溉设施不足等问题。具体而言, 2019 年提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长三十年政策, 稳定了农户对土地长期投资的预期, 但这一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土地利用细碎且分散的格局^[1]。另一方面, 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 适度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成为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措施。

适度的农村土地调整是广大农户的现实需求。2020 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显示^[2], 26.4% 的农户希望在此轮承包到期后能够重新分配土地; 而早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3], 47.27% 的农户认为土地应定期按需调整。这表明, 部分农户土地调整需求与国家土地承包权稳定政策之间存在一定分歧。妥善处理土地与农民的关系,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土地调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 不仅牵扯农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 更涉及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有学者指出^[4], 有地农户对土地调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 2024-05-06; 改回日期(Accepted date): 2024-09-23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 四川省社会科学青年基金(SCJJ23ND443)。[Social Science Youth Founda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SCJJ23ND443)]

作者简介(Biography): 李瑞盛(1998-), 男, 山东德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土地资源管理。[LI Ruisheng (1998-), male, born in Dezhou, Shandong Province, M. Sc. candidate, research o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E-mail: liruisheng@stu.sicau.edu.cn

*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徐定德(1990-), 男,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土地资源管理。[XU Dingde (1990-), male,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research o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E-mail: dingdexu@sicau.edu.cn

整的强烈需求,部分在于家庭承包的土地与劳动资源之间的不匹配,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通过土地调整来优化家庭资源配置,部分农户希望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稳定供给公共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公平的诉求,降低其对土地调整的迫切需求^[5-6]。

在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的平原地区,非土地因素在影响农户调地意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为解决“人地不均”问题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一个规范且成熟的农村土地租赁市场,能够在不引发土地调整风险的前提下,有效缓解人地矛盾,促进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7]。然而,部分地区土地调整仍然频繁,且有相当比例的农户经历了多轮农地调整^[8-9]。这表明,在某些地区,土地调整的压力仍然存在,农地稳定经营与农户调地诉求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完全化解。

小农户,作为土地利用的基本单元,其土地利用方式的多元化格局深受农村复杂地貌与多样社会环境的影响^[3,7]。学术界大多依据农业收入这单一维度进行农户分类,未能充分揭示农户群体的内在多样性和动态变化特征^[10]。为此,有学者综合考量了农业收入、精神需求及社会福利等多个维度,创新性地提出了生存型、生产型、生活型、功能型四型的农户分类框架,为更全面地理解农户差异提供了重要视角^[11]。其中,那些长期坚守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以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求为主要经营目标的农户,被界定为生存型小农^[12]。随着生存型小农的逐渐分化与转型,农户群体呈现出不同的职业特征和目标差异。但现有研究很少探讨这一创新性的分类方法如何评估农户对土地延包政策的态度。特别是在中国广泛分布的山地丘陵地区,由于地形地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和利用方式与其他地区有着显著差异^[13],但这种差异如何影响农户的土地延包意愿,目前尚未得到深入探讨。

随着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深入了解农户分化与其对稳定土地承包政策的意愿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本文将农户分化与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置于同一理论分析框架,充分考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及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地形的现实约束,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构建内生处理效应模型展开实证检

验。研究结论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改进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随着传统的生存型小农逐渐分化为生活型小农、生产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小农在农业经营目标上各有侧重,对土地延包政策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策略选择。生存型小农的经营目标在于实现自给自足,其生计决策侧重于确保家庭生活的稳定,其农业生产通常表现为劳动高度密集和边际报酬递减的特点^[10]。在丘陵山地地区,地势崎岖导致交通不便、耕地分散,加之资金支持匮乏及非农务工机会有限,生存型小农扩大经营规模常受资金、劳动力等资源制约。因此,农户倾向于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此背景下,一旦土地承包关系发生调整,可能导致其不得不放弃先前的投入,重新分配资源,这无疑会增加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14]。相比之下,平原地区的小农虽也面临资源约束和生计安全问题,但平坦的地势和农业基础设施的相对完善可为农业生产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此外,由于生存型小农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土地额外承载着家庭就业、养老等多重保障功能。总体来看,生存型小农对土地承包稳定性有较高需求,这不仅有利于长期投资和规划,还能降低生活成本和风险。

随着部分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他们的生活中心逐渐偏离农业生产。这一过程中,家庭内出现了代际分工,即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人留守务农。据统计,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3.81%,远高于城市的15.54%。这些老龄劳动力因“恋地”情结和体能所限,选择从事简单农业劳动,以满足个人及家庭基本需求,形成“生活型小农”^[15]。生活型小农家庭收入多元,其农业经营目标转向通过简单农业劳动获取价值感和幸福感。在丘陵山区,地形复杂,农业生产较为困难,生活型小农可以利用地形特点,种植当地特色作物。虽然经济收益有限,但能够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和情感寄托^[16]。在平原地区,土地相对平整,生活型小农因体能和劳动力资源限制,更倾向于种植管理简单、劳动强度低的农作物^[17]。同时,他们也能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弥补劳动力不足。当土地不

再占用过多家庭资源时,他们能更专注于非农产业,从容应对土地调整。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可使其无调地成本和风险地享受土地收益。因此,生活型小农相较于生存型小农,土地延包意愿更强。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向非农产业,部分农户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农村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18]。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 年全国规模农业经营户已达 398 万户^[19]。这些农户的经营模式已异于传统小农,转而追求扩大生产、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以最大化农业生产利润,被称为“生产型小农”^[11]。生产型小农因经营大面积土地且农业收入较高,对农用机械、社会化服务等生产要素需求大、购买力强,且资源获取更为便捷^[20]。此外,其使用的生产器械和技术人员资源适用广泛,可在村内多数农地上作业,资源利用效率高,抵御土地调整风险的能力较强^[21]。在丘陵山区,他们注重土地灵活利用与多元化种植,选择特色作物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平原地区,则倾向于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种植大宗农产品以提高产量和效率。整体来看,生产型小农能根据不同地区调整生产策略和农业决策。由于资源供给优势和风险抵御能力强,他们对土地调整的敏感性较低,对土地延包问题的意愿可能不如其他小农强烈。

由于地理环境和乡土文化的差异,各类农户可以依托自身及区域资源优势,在原有农业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延伸,发展成为“功能型小农”^[22]。例如,生产型小农依托技术和规模优势发展有机生态农业;生活型小农则改善设施,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生存型小农通过合作分工实现增收,参与功能型农业。具体而言,丘陵山区的小农利用独特地理和生态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和田园旅游,如改造农田景观、打造特色农庄,吸引游客并提供多元服务^[23]。由于复杂地形需更多投入和规划,因此他们期望产业能够持续运营。平原地区的小农则更注重有机生态农业,满足市场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利用技术和规模优势进行大规模种植,但仍需投入资源改良土地、更新设施。在此背景下,功能型小农的稳定经营预期显得尤为重要^[24]。因此,为确保产业稳定发展和持续增收,功能型小农更倾向于保持土地承包权稳定。

综上,各农户群体的土地延包意愿差异如图 1 所示,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H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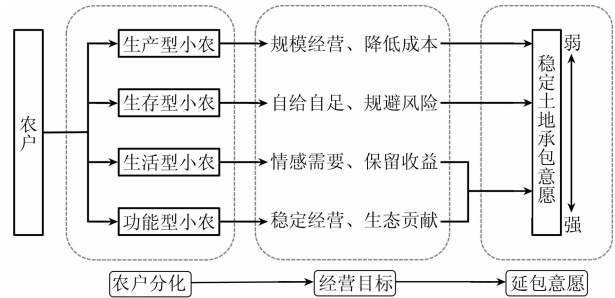


图 1 农户分化行为逻辑图

Fig. 1 Logic diagram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diversification behavior

H1: 不同类型小农其稳定土地承包意愿不同; 相比于生存型农户, 生产型农户的土地延包意愿较弱, 而生活型和功能型农户更倾向于当前土地承包的延续。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 农业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会影响农户的资源分配和生产决策, 尤其在土地流转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成熟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些区域的农地流转需求与农业生产服务供给的相对充足, 为农户处理耕地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灵活性。因此, 稳定长期的土地承包关系成为农户决策的关键, 它使农户能在不改变家庭资源分配与生活状态的情况下, 通过转出耕地或购买生产服务, 稳定获取经济收益^[7]。同时, 完善的土地流转与生产服务市场解决了稳定承包权政策可能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 不仅为农户提供了更多资源配置选项, 还有利于农业经营主体整合土地资源、扩大规模^[25]。然而, 当前各地土地流转市场与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水平仍存在显著差异。许多农村地区土地流转规范性欠缺, 服务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 导致部分土地闲置, 农户土地收益受限^[17]。农业劳动长期占用大量家庭资源和成本, 使得部分农户对土地调整需求迫切。此外, 土地流转与外包服务市场的完善程度, 既映射了当地农业发展水平, 也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户投资意愿^[10], 尤其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人地矛盾加剧, 不仅影响农户土地权益, 还可能降低生产效率, 增加耕地撂荒风险, 威胁国家农产品供给与粮食安全^[26]。

近年来, 劳动力非农转移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 这类转移不仅有效地满足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也对当地农地流转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

善为农村居民向二、三产业转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降低了转移门槛,从而为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27]。在这一背景下,拥有稳定非农收入的农户,可以不再过度依赖土地,而倾向于将其视为长期稳定资产。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劳动力转移受限的地区,农户仍面临着诸多困境。他们难以在土地之外找到其他的发展机会,因此迫切希望通过土地调整来提升土地质量、增加家庭收入^[21]。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H2。

H2: 劳动力市场、土地流转市场和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育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的稳定承包意愿。

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地形起伏直接决定农业生产的难易程度,进而左右农户的土地承包需求^[28]。平原地区因地势平坦,利于农用机械大规模高效作业。地块间海拔高度和土壤质量差异较小,减少了地块间距离带来的运输和时间成本。因此,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往往能够实现较高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16]。在这种环境下,土地承包权变动造成的风险相对较小,因为新地块与原有地块的生产条件相似,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太大的影响。然而,山地丘陵地区则截然不同。这些地区地形起伏大,土地资源有限且分布琐碎,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难度和复杂性。此外,地块间自然条件如海拔、坡度、土壤质量差异显著,许多现代化农业机械在这些地区难以施展,甚至无法使用^[21]。鉴于山地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土地调整可能带来未知生产条件,如土壤质量、水源变化。这种不确定性给农户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保持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以避免因土地调整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除了地形条件外,市场资源禀赋的差异也是影响农户调地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相比于非城郊地区,郊区农户更容易接近城市市场,可以更快感知到市场需求的变化,因此大多选择资源占用较少、可以尽快供应市场的农产品,如小麦等粮食作物,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且随着城乡距离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将逐渐提高^[29]。市场资源的不同,使得土地调整对农户群体造成的经济影响产生了差异。对于近郊农户而言,其所种植的作物大多生长周期较短,以方便根据市场信号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利用行

为。而对于非郊区农户而言,其所种植的经济类作物往往具有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需要长期稳定经营以获取收益。因此非郊区农户将更加希望土地权益的稳定与延续,否则将面临无法收回成本的风险。

基于此,可提出假说 H3。

H3: 在不同的地形、市场条件约束下,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调整意愿存在异质性。

综上,本文的理论逻辑框架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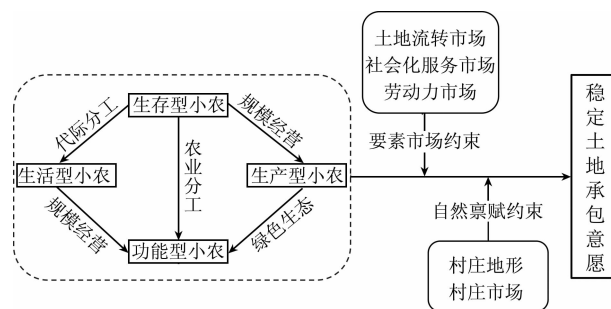


图2 分析框架图

Fig. 2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基于 2020 年 CRRS 数据库来评估农户分化对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意愿的影响。CRRS 数据库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推进的重大项目——《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及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项目》，是一项全国性的微观层面调查。涵盖的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地理与人口状况、农村产业结构、农民的经济收支与社会福祉、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乡村治理方式以及农村综合改革进展等。

在样本选择方面,CRRS 遵循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严谨方法。样本来源广泛,覆盖了全国范围内的 10 个省(自治区),并进一步涵盖了 50 个县(市)、150 个乡(镇)以及 300 个村庄。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项目组在考虑各地区的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发展状况后,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随机选择了三分之一的省份或自治区。在这些选定的省区中,所有县域被按照人均 GDP 排序,并均匀划分为 5 个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一个县,总计调查了 50 个样本县。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在每个县选择 3 个乡镇,并从这些乡镇中分别选择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的两个村落。在村落层面,

根据村委会提供的居民名单,等距随机选择 14 户农户进行深入调查,并额外选择 2 户作为备选样本。经过一系列的数据整理工作后,本研究最终获得 3804 户农户样本数据。

2.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农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意愿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通过询问农户“二轮承包到期后您是否愿意调整土地”进行测度。其中,1 表示农户愿意维持当前土地承包关系现状,0 表示农户希望在二轮承包到期后对土地进行调整。

农户分化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已有研究^[30],本文以农业经营收入高低和生活幸福感高低为标准对农户进行分类。其中,农业收入高低通过农户前一年农业收入是否高于样本村平均农业收入来表征,若高于均值则定义为高收入占比农户,低于则为低收入占比农户;农户生活幸福感高低通过问题“您满意当前的生活水平吗”来测度,该变量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 1~5 级评分,1 和 2 被视为低生活幸福感,3、4 和 5 视为高生活幸福感。基于上述标准,将农户群体分为生存型小农(低农业收入×低幸福度)、生活型小农(低农业收入×高幸福度)、生产型小农(高农业收入×低幸福度)和功能型小农(高农业收入×高幸福度)四类。四类小农群体的划分标准如图 3 所示,不同小户样本量占比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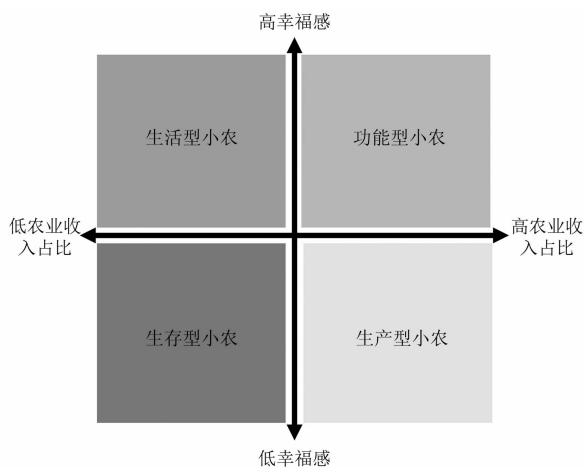


图 3 各类型农户特征

Fig. 3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he farmers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参考已有研究^[31-32],本文引入了以下三类控制变量:一是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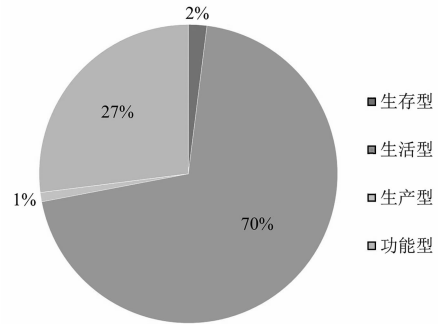


图 4 农户样本量占比

Fig. 4 Percentage of sample size of the farmers

等;二是家庭特征,包括人均年现金收入、家庭赡养比和非农就业等;三是生产特征,包括土地流转、人均承包地面积、地块数量、地块距离和农业保险等。同时,生成地区变量控制区域差异。各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3804 户样本中,55% 的农户愿意维持当前土地承包关系现状。生存型小农、生活型小农、生产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分别占比 2%、70%、1% 和 27%。全部受访农户中,男性户主占比 93%,户主平均年龄为 55.95 岁。各农户人均年收入取对数后的均值为 9.27,家庭赡养比平均为 0.18,59% 的家庭存在成员非农务工现象,家庭人口数量均值为 4.06。样本中 52% 的农户对土地进行了流转,人均承包地面积取对数后的均值为 1,平均经营地块 5.89 块,最大地块距住所距离取对数后的均值为 3.98,且有 23% 的农户购买了农业保险。

2.3 分析模型

农户经营目标的分化是基于农户自身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户分化可能受不可观测因素如风险偏好和经营能力等的影响。若利用标准的回归方法,虽然能够缓解由可观测变量所引起的选择性偏误,但无法克服由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33],采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Multinomial 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s, METE)来估计不同类型小农群体间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差异。

METE 模型包含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估计农户农业经营目标选择方程。其表达式为:

$$N_{ij} = \sigma_j X_i + \sum_{k=1}^J \beta_{jk} \delta_{jk} + \varepsilon_{ij} \quad (1)$$

式中, N_{ij} 为第 i 个农户选择第 $j(j=1,2,3,4)$ 类经营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稳定承包意愿	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户是否愿意调整土地(1 = 维持现状;0 = 其他)	0.55	0.50
解释变量	生存型	低农业收入占比 × 低生活满意度	0.02	0.15
	生活型	低农业收入占比 × 高生活满意度	0.70	0.46
	生产型	高农业收入占比 × 低生活满意度	0.01	0.08
	功能型	高农业收入占比 × 高生活满意度	0.27	0.44
	农户分化	1 = 生存型;2 = 生活型;3 = 生产型;4 = 功能型	2.52	0.91
控制变量	性别	户主性别(1 = 男性;0 = 女性)	0.93	0.25
	年龄	户主年龄	55.95	11.28
	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程度(1 = 未上学;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5 = 中专; 6 = 职高;7 = 大学专科;8 = 大学本科)	2.76	1.08
	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	9.27	1.45
	家庭赡养比	家庭老年人口数量与劳动力数量的比值	0.18	0.38
	非农务工	家庭成员是否有非农就业(0 = 否;1 = 是)	0.59	0.49
	成员数量	家庭人口数量	4.06	1.58
	流转	当前是否进行土地流转(0 = 否;1 = 是)	0.52	0.50
	人均承包地面积	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的对数	1.00	0.78
	地块数量	当前经营地块数量	5.89	8.43
	地块距离	最大地块距住所距离的对数	3.98	3.27
	农业保险	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0 = 否;1 = 是)	0.23	0.42

目标的效用; X_i 为农户经营目标选择的可观测因素,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等; δ_{jk} 为影响农户生产经营目标与土地延包意愿的不可观测因素; σ_j, β_{jk} 为待估参数; ε_{ij} 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34]。

本研究以生存型小农为参照组。由于 N_{ij} 无法直接观测,本研究将农户选择某一具体的农业经营目标视为二分类变量($d_{ij} = d_{i1}, d_{i2}, \dots, d_{iJ}$)。同样,令 $\delta_{ij} = \delta_{i1}, \delta_{i2}, \dots, \delta_{iJ}$ 。据此,农户选择某一经营决策目标的概率表示为:

$$Pr(d_i | X_i, \delta_i) = f(X_i a_1 + \sum_{K=1}^J \beta_{1k} \delta_{ik} + X_i a_2 + \sum_{K=1}^J \beta_{2k} \delta_{ik} + \dots + X_i a_J + \sum_{K=1}^J \beta_{Jk} \delta_{ik}) \quad (2)$$

其中, f 服从多项式概率分布。进一步利用混合多项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35]。其表达式为:

$$Pr(d_i | X_i, \delta_i) = \frac{\exp(X_i a_j + \beta_j \delta_{ij})}{1 + \sum_{K=1}^J \exp(X_i a_k + \beta_k \delta_{ik})} \quad (3)$$

(2) 第二阶段,不同经营目标农户对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影响效应可以利用极大模拟自然估计法,公式如下:

$$E(y_i | d_i, x_i, \delta_i) = x_i \tau + \sum_{j=1}^J r_i d_{ij} + \sum_{j=1}^J \omega_i \delta_{ij} \quad (4)$$

式中, y_i 为第 i 个农户稳定当前土地承包的意愿; x_i 为解释变量; τ 为待估参数; d_{ij}, δ_{ij} 为农户选择某一具体经营目标的二分类变量; r_i 为相对于生存型农户,其他类型农户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处理效应,即表征农户分化对其土地延包意愿的影响; ω_i 为模型估计系数。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为农户分化对农户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影响结果。模型 1~4 为采用 METE 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2 农户分化与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diversific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land contracting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生活型	生产型	功能型	稳定承包意愿	稳定承包意愿
生活型				0.136 *** (0.051)	0.603 *** (0.222)
生产型				0.087 (0.113)	0.395 (0.484)
功能型				0.149 *** (0.053)	0.683 *** (0.230)
性别	-0.025 (0.097)	-0.286 (0.287)	0.156 (0.102)	-0.172 (0.183)	-0.409 *** (0.145)
年龄	0.007 *** (0.002)	-0.020 *** (0.007)	-0.004 * (0.002)	-0.004 (0.013)	0.007 ** (0.003)
教育程度	0.076 *** (0.023)	-0.162 ** (0.078)	-0.047 ** (0.023)	-0.038 (0.106)	0.014 (0.034)
人均年收入	-0.290 *** (0.028)	-0.040 (0.031)	0.416 *** (0.027)	-0.022 (0.139)	0.012 (0.026)
家庭赡养比	0.079 (0.069)	0.083 (0.224)	-0.058 (0.072)	0.093 (0.058)	0.277 *** (0.100)
非农务工	0.219 *** (0.052)	0.222 (0.181)	-0.271 *** (0.054)	0.104 (0.159)	0.096 (0.077)
成员数量	-0.119 *** (0.017)	0.042 (0.060)	0.139 *** (0.018)	-0.027 (0.059)	-0.130 *** (0.025)
流转	-0.007 (0.047)	-0.032 (0.173)	-0.013 (0.049)	-0.078 *** (0.026)	-0.282 *** (0.071)
人均承包地面积	-0.084 ** (0.041)	0.143 (0.092)	0.100 ** (0.043)	0.069 (0.101)	0.143 ** (0.065)
地块数量	-0.016 *** (0.004)	-0.001 (0.010)	0.016 *** (0.004)	-0.003 (0.005)	-0.002 (0.004)
地块距离	-0.084 *** (0.009)	0.045 (0.031)	0.095 *** (0.009)	-0.010 (0.047)	-0.072 *** (0.013)
农业保险	-0.047 (0.060)	-0.244 (0.208)	0.079 (0.061)	-0.122 (0.153)	-0.204 ** (0.093)
地区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β_1				0.177 (0.264)	
β_2				0.304 (0.667)	
β_3				0.004 (0.339)	
常数项	3.647 *** (0.363)	-4.746 *** (0.566)	-5.386 *** (0.357)	-0.885 (4.018)	0.357 (0.444)
卡方检验	405.309	1521.798	508.827	252.664	220.171
样本量	3804	3804	3804	3804	3804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其中,模型 1~3 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即估计农户农业经营目标选择;模型 4 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即不同农户群体对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影响效应, β_1 、 β_2 与 β_3 为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系数。模型 4 结果显示,以生存型小农为参照组时,生产型小农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相较于生存型小农,生产型小农的经营目标对农户土地承包意愿没有明显影响,而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的经营目标显著提高了农户稳定土地承包的意愿。正如前文所述,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出于个人体能的限制及稳定经营的需要,并不希望对当前的土地利用状态进行调整,从而具有更强的稳定承包意愿。由此,H1 得以验证。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四类农户变量替换为单一农户分化变量并根据农户类型进行赋值(1 = 生存型;2 = 生活型;3 = 生产型;4 = 功能型),采用 Logistic 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模型 5 所示。由模型 5 可知,以生存型小农为参照组时,农户分化与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1~4 估计结果类似,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2 基于三大要素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并参考现有研究,本文以各村内购买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比例是否高于样本均值来划分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差异^[36];以样本农户所在村内土地流转的比例是否高于样本均

值来划分地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差异^[37];以各村内雇工劳动的工资水平是否高于样本均值来划分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差异^[38],其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以生存型小农为参照组)。

模型6和模型7分别是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较完备地区和较匮乏地区的回归结果。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相较于生存型小农,生活型和功能型小农的土地延包意愿更强。可见,充裕的农业生产服务供给可以帮助农户在不影响当前家庭资源分配和生活状态的情况下稳定享有承包地所带来的收益,从而稳定其土地延包意愿。模型8和模型9分别是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发达地区和较落后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生活型和功能型小农不必因农业生产投入过多的资源,且通过土地获取收益的机会更多,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户投资意愿,进而降低农户调地意愿。模型10和模型11分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高于样本均值地区和低于样本均值地区的回归结果。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相较于生存型小农,生活型、功能型小农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门槛更低,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因此,对拥有较为稳定收入的农户,与其承担土地变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如将土地作为增值性资产稳定持有。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农户维持土地承包关系的意愿会更加坚定。由此,H2得以验证。

3.3 基于地形、市场条件约束条件下的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处于不同地形和不同市场的农户,其土地延包意愿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根据是否平原地区和是否城郊区,将样本分为平原地区和非平原地区、城郊区和非城郊区,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内部农户延包意愿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以生存型小农为参照组)。

模型12和模型13分别是平原地区和山地丘陵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同地形农户的土地延包意愿不同。在山地丘陵地区,由于不同地块间进行农业生产的难度存在较大差异,土地调整给农户带来的生产风险可能更高,从而使农户具备更高的稳定意愿。模型14和模型15分别是城郊地区和非城郊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生存型小农,非城郊区生活型、功能型

表3 三大要素市场对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
Tab. 3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three factor markets on willingness to land contracting

约束条件	条件差异	模型	农户类别			样本量
			生活型	生产型	功能型	
社会化服务市场	高水平	模型6	0.165 ** (0.079)	-0.092 (0.201)	0.207 ** (0.082)	1867
	低水平	模型7	0.109 (0.067)	0.123 (0.137)	0.087 (0.070)	1937
土地流转市场	高水平	模型8	0.174 ** (0.076)	-0.052 (0.178)	0.177 ** (0.079)	1853
	低水平	模型9	0.102 (0.070)	0.177 (0.146)	0.127 * (0.073)	1951
劳动力市场	高水平	模型10	0.193 *** (0.069)	0.198 (0.154)	0.164 ** (0.073)	1810
	低水平	模型11	0.054 (0.076)	-0.034 (0.170)	0.104 (0.079)	1994

表4 地形、市场条件对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
Tab. 4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topography and market conditions on willingness to land contracting

约束条件	条件差异	模型	农户类别			样本量
			生活型	生产型	功能型	
村庄地形	平原	模型12	0.158 (0.099)	-0.070 (0.207)	0.169 * (0.102)	1672
	丘陵山地	模型13	0.122 ** (0.060)	0.173 (0.139)	0.142 ** (0.063)	2132
村庄市场	城郊区	模型14	0.153 (0.155)	-0.016 (0.252)	0.089 (0.160)	808
	非城郊区	模型15	0.124 ** (0.054)	0.126 (0.132)	0.161 *** (0.057)	2996

小农的土地延包意愿较城郊区农户更强。可见非郊区农户的农业经营偏向长期投资、稳定经营,因此需要稳定的土地承包权作为经营基础。由此,H3得以验证。

4 讨论

土地承包关系的长久不变有利于维系农户对土地的投资信心,遏制其过度透支地力的短视行为。鉴于此,为了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确保农业经营的持久性与可持续性,农村土地的第二轮承包期限在届满后将延展三十年。然而,近年来相关研究揭示,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着较高的土地调整的诉求^[2,7]。因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深入探究农户对于土地承包权延期的态度,以及影响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意愿的动因,对平稳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国家政策,制定更贴近农户实际需求的土地调整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梳理发现,多数学者倾向于探求一种普遍适用于各类小农户的发展路径,往往将不同区域、类型的农户视为具有统一生存目标和生产特性的同质群体^[3,7,30,33]。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家庭决策模式的转变,农户群体在经济活动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日益凸显。因此,本研究在吸纳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户细分为生存型、生活型、生产型和功能型四类,并依托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为农户分化与土地承包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支撑,旨在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决策依据。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当前阶段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中国地形多样,山地、丘陵、高原等地貌占据国土面积的较大比例,这无疑增加了农业机械化推广的难度^[39]。特别是在丘陵山区,地势的崎岖不平使得大型农机具难以进入和操作,土地资源的先天不足阻碍了大规模连片种植的实现,进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其次,许多地区的农田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和田间道路仍不完善,这直接导致农机具难以进入田地作业,限制了农机和先进技术的适用性和通用性。再者,目前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以年龄偏大、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人群为主,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接受程度有限,部分农民缺乏操作和维

护先进设备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加之农机作业和维护成本高昂,普通农户家庭难以负担。

因此,中国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发展不能单纯依赖于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而需在长期土地承包权构建的制度基石上,结合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多种手段协同推进。一方面,土地流转能够将零散的土地资源整合起来,形成连片的大规模农田,便于大型农机的作业。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增加农民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同时,土地流转还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身非农产业或进城务工,从而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能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和支持。通过这些专业服务,农业生产者能够进行科学、高效地耕作,进而降低农业机械化的交易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由此可见,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不仅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够享受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在地势复杂、人多地少且经营分散的农业生产背景下,得益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农户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实现土地的集中和高效利用,推动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进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基于农户群体间土地延包意愿的差异分析,进一步探究土地承包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并探索当前及未来农业经营的新体制、新模式,将是本研究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拓展和深化的重要方向。

5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尊重农户分化现实,实施差异化土地政策。政策制定者应根据农户经营目标、生产能力、家庭资源分配及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采取差异化的土地政策。对于生存型小农,应增强农业补贴,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其对土地的过度依赖。对于生产型小农,应鼓励其扩大生产规模,通过金融支持和市场拓展服务,促进其向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小农户

对土地的合法权益,确保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针对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应聚焦于保护其土地承包权益,提供多元化土地利用政策,以支持其在新兴产业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领域的发展。

(2)充分考虑现实资源禀赋的现实约束,不同区域分类探索土地延包和调整政策。除了考虑农户分化的现实情况外,还应认识到中国不同地区面临不同的资源禀赋约束,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并审慎推进土地延包和调整政策。比如,部分地区试点的一户一田、反租倒包、农业托管等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问题。然而,这些政策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还有待现实的进一步检验。此外,为确保政策的有效传达与实施,基层组织应通过多渠道对土地延包政策进行宣传与解读,稳定农户对稳定地权相关政策的积极态度。在实际政策推动中,应尊重当地农户的实际调整意愿,满足多数农户维持当前土地承包关系的诉求,同时充分考量部分农户的客观调地需求,以保障各类农户的权益。

6 结论

本文构建了农户分化与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梳理清楚了不同类型农户在三大要素市场发育及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的现实条件下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路径,对相关研究是一个理论上的拓展。基于全国大样本调查数据,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约束条件下农户分化对稳定土地承包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现阶段农户已分化为生存型小农、生活型小农、生产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样本中各类农户占比分别为2%、70%、1%和27%,其中45%的农户希望在二轮承包到期后对当前土地进行调整。

(2)相较于生存型小农,生产型小农在土地延包意愿上没有明显的偏好,而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承包关系意愿。

(3)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差异的影响下,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在社会化服务市场、土地流转市场及劳动力就业市场发达地区的稳定土地承包意愿强于欠发达地区。

(4)异质性结果分析表明,在非平原地区、非城郊区的生活型小农和功能型小农更倾向于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罗玉辉,程恩富.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的思考[J].中州学刊,2023(5):50-57.[LUO Yuhui, CHENG Enfu. Reflection on the policy of “extending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ing for another 30 years after its expiration” [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3(5): 50-57] DOI: 10.3969/j.issn.1003-0751.2023.05.008
- [2] 汪险生,郭忠兴,宋宇,等.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农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3):157-177.[WANG Xiansheng, GUO Zhongxing, SONG Yu, et al. Farmers' willingness to stabilize the land contract relationship facing the upcoming expiry of land contracts [J]. China Rural Economy, 2023(3): 157-177] DOI: 10.20077/j.cnki.11-1262/f.2023.03.009
- [3] 张三峰,杨德才.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1):15-24+33+94.[ZHANG Sanfeng, YANG Decai. Farmers' willingness of land reallocations and the determinant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CGSS in 2006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0(1): 15-24+33+94]
- [4] 贺雪峰.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由来、逻辑与出路[J].思想战线,2015,41(5):75-80.[HE Xuefeng. The origin, logic and way out of the right to confirm the right to contract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J]. Thinking, 2015, 41(5): 75-80] DOI: 10.3969/j.issn.1001-778X.2015.05.013
- [5] 宋文飞,李国平,韩先锋,等.“产权公共域”与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的理论机理剖析:基于租金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6):84-93.[SONG Wenfei, LI Guoping, HAN Xianfeng, et al. “Property right in public domain” a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A rent perspective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26(6): 84-93] DOI: 10.3969/j.issn.1002-2104.2016.06.011
- [6] 高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演进与阶段性特征[J].改革,2017(10):119-123.[GAO Fan. The policy evolution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ng-term unchanged rural land contract relationship [J]. Reform, 2017(10): 119-123]
- [7] 张兰,孔岩,樊鹏飞,等.非农就业、土地流转抑制了农户当前及二轮承包到期时土地调整意愿吗[J].农业技术经济,2022(9):122-133.[ZHANG Lan, KONG Yan, FAN Pengfei, et al. Do off-farm employment and land transfer restrai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djust land at present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round contracting?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9): 122-133] DOI: 10.13246/j.cnki.jae.2022.09.004
- [8] 冀县卿,黄季焜.改革三十年农地使用权演变:国家政策与实际执行的对比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5):27-32+110-111.[JI Xianqing, HUANG Jikun. Evolution of farm land use rights during thirty years of reform in China: A comparative

- analysis of policy evolu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between 1978 and 2008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 **34**(5): 27–32 + 110–111] DOI: 10.13246/j.cnki.iae.2013.05.006
- [9] 郑志浩, 高杨. 中央“不得调地”政策: 农民的态度与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基于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 5 省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4): 72–86. [ZHENG Zhihao, GAO Yang.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no land readjustment: Farmers' attitudes and land reallocation in villages: A study on farm households from five provinces in China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7(4): 72–86]
- [10] 赵丹丹, 周宏, 高富雄. 农户分化、技术约束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技术采纳理论分析框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12): 2956–2967. [ZHAO Dandan, ZHOU Hong, GAO Fuxiong.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technical constraint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selec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farmer households' technological adoption based on different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12): 2956–2967] DOI: 10.31497/zrzyxb.20201211
- [11] 张露, 罗必良. 农业减量化: 农户经营的规模逻辑及其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2): 81–99. [ZHANG Lu, LUO Biliang. Agricultural chemical reduction: The logic and evidence based on farmland operation scale of households [J]. *China Rural Economy*, 2020(2): 81–99]
- [12] 马良灿. 理性小农抑或生存小农——实体小农学派对形式小农学派的批判与反思[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4): 165–172. [MA Liangcan. Rational small farmers or survival small farmer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f entity small farmer school on form small farmer school [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4(4): 165–172]
- [13] 林坚, 李德洗. 非农就业与粮食生产: 替代抑或互补——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9): 54–62. [LIN Jian, LI Dexi. Non-farm employment and food production: Substitution or complementar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major food-producing areas [J]. *China Rural Economy*, 2013(9): 54–62]
- [14] LI Fang, FENG Shuyi, LU Hualiang, et al. How do non-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mpact on large-scale farming? A spatial panel data analysis from Jiangsu Province, China [J]. *Land Use Policy*, 2021, **107**: 105517.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517
- [15] 郑沃林, 胡新艳, 罗必良. 气候风险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1, **36**(8): 66–74. [ZHENG Wolin, HU Xinyan, LU Biliang.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farmer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ecision and i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21, **36**(8): 66–74] DOI: 10.3969/j.issn.1007–3116.2021.08.007
- [16] 杨高第, 张露.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江汉平原水稻主产区的证据[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848–1864. [YANG Gaodi, ZHANG Lu.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on farm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s of farmers: Evidence from the main rice-producing areas in Jiangnan Plain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848–1864] DOI: 10.31497/zrzyxb.20220713
- [17] 张亚丽, 白云丽, 甄霖, 等. 新农保能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吗? ——基于 CHARLS 三期面板数据[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5): 1016–1026. [ZHANG Yali, BAI Yunli, ZHEN Lin, et al. Could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promote farmers' 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ree waves panel data of CHARLS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5): 1016–1026] DOI: 10.31497/zrzyxb.20190509
- [18] 米巧, 杜道颖, 贾娟娟. 新质农业劳动力培育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以棉花生产为例[J]. *财经科学*, 2024(8): 135–148. [MI Qiao, DU Xiaoying, JIA Juanjuan. The impact of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on crop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cotton yield [J]. *Finance & Economics*, 2024(8): 135–148]
- [19] 曾俊霞, 郜亮亮, 王宾, 等. 谁是职业农民——基于 9763 名职业农民的调查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1): 44–64. [ZENG Junxia, GAO Liangliang, WANG Bin, et al. Who are professional farmers? —survey analysis based on nearly 9763 professional farmers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3, **40**(1): 44–64] DOI: 10.13240/j.cnki.caujsse.2023.01.003
- [20] 钟甫宁, 陆五一, 徐志刚.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利于粮食生产吗? ——对农户要素替代与种植结构调整行为及约束条件的解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7): 36–47. [ZHONG Funing, LU Wuyi, XU Zhigang. Is the rural labor force going out to work detrimental to food production? —an analysis of farming households' factor substitution and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behavior and constraints [J]. *China Rural Economy*, 2016(7): 36–47]
- [21] QIAN Long, LU Hua, GAO Qiang, et al. Household-owned farm machinery vs. outsourced machinery services: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on the land leasing behavior of relatively large-scale farmers in China [J]. *Land Use Policy*, 2022, **115**: 106008.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2.106008
- [22] 宋登力, 周洪, 刘秀华, 等.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J]. *山地学报*, 2020, **38**(4): 581–595. [SONG Dengli, ZHOU Hong, LIU Xiuhua, et al. Analysis of the obstacles to farmland scale transfer in mountainous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labor e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China [J]. *Mountain Research*, 2020, **38**(4): 581–595]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536
- [23] YANG Jun, YANG Ruxin, CHEN M H, et al. Effects of rural

- revitalization on rural tourism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47**: 35 – 45. DOI: 10.1016/j.jhtm.2021.02.008
- [24] LIU Chunyan, DOU Xueting, LI Jiangfeng, et al. Analyzing government rol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9**: 177 – 188. DOI: 10.1016/j.jrurstud.2020.08.046
- [25] 谭淑豪, 王硕, 叶卓卉, 等. 土地流转会加剧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经营规模的异质性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1): 2841 – 2855. [TAN Shuhao, WANG Shuo, YE Zhuohui, et al. Will land transfer aggravate “non-grain” of agricultural land? 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ased on farmland scales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1): 2841 – 2855] DOI: 10.31497/zrzyxb.20231110
- [26] 谢花林, 黄萤乾.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408 – 423. [XIE Hualin, HUANG Yingqian.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land transfer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behaviors of farmer: A case study in Fujian-Jiangxi-Hunan mountainous areas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2): 408 – 423] DOI: 10.31497/zrzyxb.20220210
- [27] 唐晨珂, 刘颖, 舒丽琼. 迁出地视角下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调查数据为例[J]. *山地学报*, 2022, **40**(3): 421 – 433. [TANG Chenke, LIU Ying, SHU Liqiong. Analysis of returning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Sichuan Province, China [J]. *Mountain Research*, 2022, **40**(3): 421 – 433]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682
- [28] 邓伟, 张少尧, 王占韵, 等. 乡村振兴: 山村发展路径与模式的科学探究[J]. *山地学报*, 2022, **40**(6): 791 – 800. [DENG Wei, ZHANG Shaoyao, WANG Zhanyun, et al.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Scientific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mode of mountain villages [J]. *Mountain Research*, 2022, **40**(6): 791 – 800]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713
- [29] 刘洪彬, 吕杰. 基于农户微观视角下的大城市郊区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5, **30**(7): 1129 – 1140. [LIU Hongbin, LYU Jie. Analyzing the soil quality change mechanism of the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the household in the metropolitan suburban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5, **30**(7): 1129 – 1140] DOI: 10.11849/zrzyxb.2015.07.006
- [30] 张露, 罗必良. 农业的减量化逻辑: 一个分析框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4): 15 – 26. [ZHANG Lu, LUO Biliang. The logic of chemical use reduction in agriculture: An analyzing structure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4): 15 – 26] DOI: 10.13246/j.cnki.iae.2022.04.002
- [31] 罗必良, 何应龙, 汪沙, 等. 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户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农户问卷[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6): 4 – 19. [LUO Biliang, HE Yinglong, WANG Sha, et al.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 Analysi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China Rural Economy*, 2012(6): 4 – 19]
- [32] 刘同山, 孔祥智. 确权颁证、子孙传承与农民的承包地转让意愿[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3): 159 – 166. [LIU Tongshan, KONG Xiangzhi. Land titling, descendant inheritance and peasant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contracted farmland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29**(3): 159 – 166] DOI: 10.12062/cpre.20181017
- [33] 张露. 小农分化、行为差异与农业减量化[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6): 131 – 142. [ZHANG Lu. Small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behavioral differences and agricultural chemical reduction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0(6): 131 – 142] DOI: 10.13246/j.cnki.iae.2020.06.012
- [34] KHONJE M G, MANDA J, MKANDAWIRE P. Adoption and welfare impacts of multip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Evidence from eastern Zambia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8, **49**(5): 599 – 609. DOI: 10.1111/agec.12445
- [35] MANDA J, ALENE A D, GARDEBROEK C. Adoption and impacts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on maize yields and incomes: Evidence from rural Zambia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67**(1): 130 – 153. DOI: 10.1111/1477-9552.12127
- [36] 闫桂权, 何玉成, 张晓恒.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促进农业机械化——基于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视角[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1): 51 – 64. [YAN Guiquan, HE Yucheng, ZHANG Xiaoheng. Ca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utsourcing service market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1): 51 – 64] DOI: 10.13246/j.cnki.jae.2022.01.011
- [37] 唐旺, 周聪, 陈风波. 农地市场发育与人情租金收敛——基于南方稻农地块层次数据的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6): 35 – 49. [TANG Wang, ZHOU Cong, CHEN Fengbo.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market and the convergence of relationship rent: Research based on the plot level data of rice farm households in southern China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6): 35 – 49] DOI: 10.13246/j.cnki.jae.20230314.005
- [38] 罗必良, 孟晓志, 耿鹏鹏. 种植类型、市场化与村庄信任格局转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3): 74 – 94. [LUO Biliang, MENG Xiaozhi, GENG Pengpeng. Planting type, marketization and village trust pattern transformation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3, **40**(3): 74 – 94] DOI: 10.13240/j.cnki.caujsse.2023.03.013
- [39] 段丁琪, 张浩哲, 饶洁, 等. 1990—2015年四川盆地农地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J]. *山地学报*, 2024, **42**(3): 334 –

346. [DUAN Dingqi, ZHANG Haozhe, RAO Jie,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driving forces in Sichuan

basin, China, 1990 – 2015 [J]. Mountain Research, 2024, 42 (3): 334 – 346]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827

Peasant Household Diversification and Associated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Renew Land Contract

LI Ruisheng^a, ZHOU Wenfeng^a, XU Dingde^{a,b*}

(*a. College of Management; b.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Food Security and Tianfu Granary,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4, China*)

Abstract: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tinues to reshape the income structure and land utilization patterns of peasant households in rural China. As the second round of national land contracting approaches its end, it remained unclear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peasant households had unanimous willingness to maintain current land contracting.

In this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3804 peasant households collected during the 2020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it employed an 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peasant household diversification on willingness to renew land contracting.

(1) Peasant households in China had evolved into four types: survival-oriented, lifestyle-oriented, production-oriented, and functional-oriented smallholders, accounting for 2%, 70%, 1%, and 27% of the reviewed sample, respectively, with 45% of the households desiring to adjust the land after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contracting expires.

(2) Compared to subsistence-oriented smallholde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willingness to extend land contracting for production-oriented smallholders, while lifestyle-oriented and functional-oriented smallholders expressed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maintain stabl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s.

(3) Lifestyle-oriented and functional-oriented smallholders in regions with abundant market resources, hilly areas, and non-urban districts prefer long-term stability in land contracting.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table farmland management and farmer households' demands for land adjustment, to ease human-land relations, and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land system reform in China, two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1) respect the reality of peasant household diversification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land policies for diversified households. (2) Fully consider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 endow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explore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and adjustm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policies.

Key words: land contracting; peasant household diversification; land adjustment; land transfer; willingness to land contracting

(责任编辑 李 嵘)